

脫掉高跟鞋之後

女性主義的內涵與省思

策劃
執行

北青社
文化社
女研組

你或許會納悶：「男女已經很平等了，真不知道女性主義還要搞什麼名堂？」其實這正是目前女性主義運動所面臨的最大難題，因為在擁有過去婦女從未享有的「教育權」和「參政權」之後，今日的婦女似乎也應該心滿意足了，為什麼還要「得寸進尺」地從事婦運呢？面對大多數男性和來自女性自身的疑慮和排拒，我們希望藉由這個專題的製作，從婦女歷史地位的演進說起，到近代婦女運動的興革過程及其派別的簡介，讓我們對這個悠關二十一世紀兩性角色重新定位的重大課題，能有全盤的了解和認識。

女性主義其實就是主張男女平等的主義，但是「平等」並不只是擁有「教育權」和「參政權」的形式上平等，最重要的是在「意識型態」中建立兩性平等的概念。在舊有的父權體制之中，權利財產的傳承是建立在「父傳子」的形式上，女性處於被支配的地位，本身被排除在體制之外，只能做為生兒育女的「生產機器」，從而被動地鞏固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架構。但是在現今「民智已開」的社會條件下，多少人心目中還存有「妻以夫貴」「母以子貴」的想法呢？有多少人還是認為女兒是「賠錢貨」呢？當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在面臨家庭和事業的抉擇時，傳統想法還是「男主外女主內」地壓迫女性放棄事業走入廚房，却不知家庭是夫妻雙方共同建立，家事和養育兒女的責任應由夫婦「共同負擔」，待在家裏做個「安定社會」的家庭主婦也許是好的，但是我們希望透過理智的思考，讓婦女有選擇「要或不要」的權利，而不是在遇到選擇的關卡時，丈夫一句「我養得起妳」可以解決的。現在，就請你把「心中的水倒掉」，拋開原有的誤會和成見，讓我們平心靜氣地一起看看女性主義的內容，共同為這個切身的問題做深刻的反省。

女性何以淪為第二性？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提到：「女性不是生為女人，而是變成女人的，沒有任何先天生物學上的、心理學上的，或者經濟學上的因素能決定婦女在社會裏的形象」。

她相信造成今日婦女被貶抑為第二性的理由，社會化的影響遠大於生物學上女性的定義。由人類文化進展的種種階段作觀察，不難從中理解其立論根據。

由母系社會到父系社會

首先，多數研究支持原始社會乃是母系社會的說法。

母系社會中女性崇高地位的建立乃由其擁有生育能力而來。父親身分尚未被確定前，男性在綿衍種族方面，毫無地位可言。在狩獵、游牧的生活型態下，男、女性在勞動力的提供上是約略平等的，而女性因肩負延續種族生命之獨有權利，成社會中心。

然而，當男性察覺他們在交媾中的重要性，且對女性懷孕與繁衍後代

能力有相同的決定權時，情勢開始改變。男性漸漸利用各種方式爭取權力，這其中的轉機是攝食方式的改變。

農耕生活開始，男性從事耕種之生產勞動，女性受限於耗費大半體力和時間的生育責任，必須接受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制度，而生產工具改進後，糧食產量提升，工具和剩餘的糧食累積為財產，屬於操持工具的男性所有。私有財產制漸漸形成，財產的傳承也成重要問題。

男性為鞏固其私有財產建立父傳子的財產繼承體系，原始的母系制度漸漸被打破，血緣的計算，就改由父系而來了。

那麼此時女性社會地位何在？

男性為確立繼承者（即其後裔）

血統之合法性，創婚姻制度，女性擔任妻子的角色，負生育之職，而其子代表男方家族血統，而妻子似為穩固婚姻制度的基礎，實為婚姻制度的標準而已。

父權體系的價值觀

在父系制度的社會結構下，女性以家庭角色為其社會角色。女性被教導如何由女孩、變成妻子、母親，最後成為婆婆，除此之外的知識則完全被忽略。

既然婚姻被視為父系血統的保證，妻子的道德格外受約束。父系社會是罪惡。不但是生理上的束縛，也進行精神上的；用恐嚇的方式保持婦女的道德，或教育的方式灌輸貞操的重要。且將女性二元畫分：頌揚所謂貞節無慾的賢妻良母，譴責所謂淫穢無恥的妖女蕩婦。即使現代女性仍未逃離此一魔障，下意識地受其影響而視性為洪水猛獸。

在此同時，對男性的性道德標準顯然不同，娼妓的存在，尋花問柳的男性被視為風流，甚至反對一切私通的基督教亦出現矛盾的說法，認為一個女人如果有婚姻之外的性交行為，



即為犯罪，而一個男人只有與他人的妻子性交才會受譴責，因他犯了侵犯他人財產的罪。性道德的雙重標準，其實是父系社會對女性採取的低能化思想教育。

中國儒教的「三從四德——幼時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實際為世界性的傾向。傳統女性以家庭角色為進入社會的唯一管道。丈夫、兒子的成就操縱女性的社會地位。教育女性沈醉於「成功男性背後」、「推動搖籃的手，推動世界的手」的角色，用來掩飾婦女客觀上的從屬和被壓迫的假面具。

在中國，傳統社會家族中年長而地位崇高的母親形象，實為一既定的父親形象。如孟母、岳母之所以被父系社會之權力結構認可，並進入文化歷史，完全因「教子有方」，是此權力結構的佈道者。她們並不代表婦女或婦女的地位，而是父系社會的價值和權力。

弗洛伊德理論中的性別歧視，點明父權中心思想對女性發展設下的限制與壓迫。

他研究十九世紀維也納中產階級婦女的情況，提出生物歸納論，即「人體結構就是命運」；男女在解剖學

上的差異，使女孩產生陽具羨慕，產生想成為男子的願望和對女性的嫌惡情緒；性別差異鎖定在社會結構內強勢男性和弱勢女性的對等位置。重男輕女的心理學影響相當深刻久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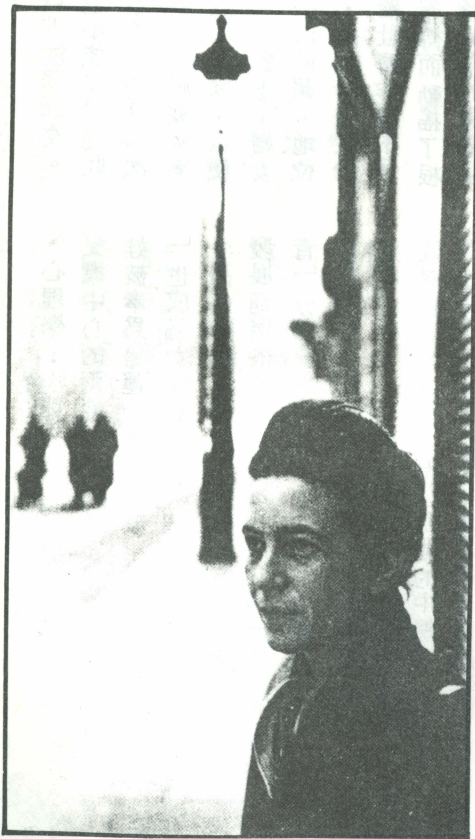
資本主義加烈性別歧視

如文章前段所述，分工制度是婦女能力遭漠視而導致婦女地位不彰的重要理由。資本主義使勞力專業化，男性離家外出，從事有償的勞動經濟，而女性居家為無償的情感角色。工業化加速生產量和資本累積，此時所謂賢妻良母仍在家中從事被認為缺乏創造性且不具生產力的工作，家事為女性天職，不重要也是無酬的。女性喪失機會參與家庭之外的人類文明建設，而貶抑其能力，這極不公平。

當女性意識到淪為「第二性」痛苦時，開始爭取權力，企圖掙脫父系社會加諸己身的種種不平。

婦運的演進及派別

順著歷史的腳步一路走來，我們可以看到，當女性意識到自己所處的——一個受壓迫的地位之後，對壓迫者——父權體制——的反抗及對自己



以「第二性」一書成為今日女權思想啟蒙者的西蒙·波娃

權利的爭取，成爲隨之而來的動作。

但是早期的她們，即便其中也有成功的例子，卻多半基於個人的覺醒與努力，獨立對抗整個大環境。於女性地位的整體提昇，雖非毫無助益，作用畢竟不大。因此我們談「婦女運動」，要從十八世紀末看起。

第一波婦運

一般來說，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時，女志士古傑（Olympe de Gouges）的「婦女權利宣言」被稱爲是婦運的開端。打從英國光榮革命、美國獨立革命及法國大革命以來，到處是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的呼聲。婦女從民主人權的思想出發，參與了革命的過程，然而卻發現自己只是「爲他人作嫁」，在「人人均有投票權」的背後，婦女竟被排除在外！因此隨之而來，以女性自覺爲出發點的，要求參政權及教育、工作等平等權的呼聲，也就越來越高了。

這一波婦運可以稱得上是世界的潮流，經過十九世紀整整百年的漫長奮鬥，東、西方許多國家，均在二十

世紀初年通過女性參政的法律條文。

可惜，這個改變並不能保證從此女性就走上了她們的坦途。隨著一次世界大戰而來的經濟蕭條，社會風氣日趨保守，婦女又被導入家庭，以便把就業市場讓給男性。事實上，婦女參政並不積極，工作仍以低薪、地位低者居多，教育方面，也多半限定於某些範疇或科系。父權社會非但不會因婦女的合法權利的獲得而動搖了根本，反而使得婦運模糊掉它的焦點。

第二波婦運

六〇年代美國各種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反叛者」的溫床，第二波婦運於是在美國的主導下，由貝蒂·福瑞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書揭開序幕。

這一波婦運之所以轟轟烈烈，影響廣泛而深遠，其實是「其來有自」。一九四九年，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出版，從存在主義出發，就文化、神話、生物性

、心理學……等方面，提出一套破解父權中心的兩性神話的思考邏輯。波娃被奉爲婦運的精神導師，「第二性」也成爲女性主義理論的「教科書」。另一方面，節育的觀念與避孕技術發展到這個階段，使得「性」與「生育」分離成爲可能，女性可以透過性解放重新掌握對自己身體的控制。受過相當教育，有錢有閒的中產階級女性更在覺醒之後，擔任婦運的中堅。

這一時期的女性利用請願、演講、印發小冊，乃至於示威等方式，要求一種社會形態的整體改變。諸如：不再拘泥於傳統的性別角色，女性在「性」的平等及生育的控制權，消除教育、就業方面有形無形的歧視，均成爲她們抗爭的重點。

但是，七〇年代直接而激烈的動作所帶來的影響，並非全是正面、積極的。相反，經過路線及理論不斷的修正，今日的婦運已經不再是搖旗吶喊地向男性「討回公道」。它走入學術與生活的各個領域——女性學研究、女性主義哲學、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打算經由迂迴戰術，從根本上顛覆掉父權體制。



女性主義的派別

保守主義的女性主義

嚴格來說，它並不能算是「女性主義」。但時至今日，此一觀念的影響力仍是不容忽視的。基本上，它主張男女因生理特質不同，適合的工作、生活領域便也不同，「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分工乃「符合自然」。

這一派人歸納出女性因具生育的能力，天生的「母性」使得她們適合待在家庭的領域中；而男性則因具有政治、經濟等公共事務方面的專長，應該從事社會性的事務。

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

這一派理論主要是：反對生物決定論，認為性別角色均是後天社會化的結果，並著力於法律對女性的保障作用。因此，他們很早就爭取女性在法律上與男性的平等地位。

然而，它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強調「個人的覺醒及選擇的自由」，卻因對大多數中低階層婦女的幫助不

大，而被批評為「資本主義中產階級思想」。只是無論如何它已擺脫了女性被視為單一的刻板角色類別，要求女性得到作為「個體」的尊重。

古典馬克思的女性主義

以古典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的這個派別，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之下，婦女是不可能獲得解放的。因此只有廢除了私有財產制，才能使婦女從受家庭、男性剝削情況解放。

雖然它的確指出了女性在不同的階級之中不易團結，甚至成為結合同階級的男性，去壓迫低階級女性的事實，性別歧視的意識形態仍未解除。從蘇俄及中國大陸的經驗來看，它在實踐上的成效仍然不彰。

激進的女性主義

認為除了經濟上的階級鬥爭外，「性別階級系統」(sexual class system)才是解開女性受歧視原因的鎖鑰。

基本上，性別階級的劃分標準是「生物性」上的男性與女性。男性利用女性的生育功能，使其轉化為女性的弱點——由於天生的「母性」，女性「只」適合扮演溫柔、照顧者的角色，甚至將其內化成較柔弱、被動的陰性人格——於是混淆了人為的制約與自然的相異，從而合法化其對女人的壓迫。

所以，女性想要破除這其中的「魔障」，就該從政治的層面上，全面破除性別階級系統。

女同性戀分離主義

她們主張，唯有以「女性認同」的方式，才能徹底反叛父權宰制。並且挑戰異性戀的意識形態，轉而從同性戀當中實踐真正的平等對待。

顯然地，此派學說雖具女性團體的發展與女性認同的獨立性等優點，卻因與兩性社會的現行結構不合，而有實踐上的困難。

社會主義

的女性主義

結合了性別階級系統與經濟體制



台灣的女性參政，尚待走出「代夫出征」的陰影。



的女人。而不必痛苦的閹割自己。現在已證明了爲人之母的經驗可以扮演一創造性的角色，對女人的感性和智力的發展均有助益。這可從許多女人努力爭取懷胎，並寄厚望於人工受精的技術改進上得知。

九〇年代新趨勢

在美國，已有二分之一的已婚婦女爲再婚，有四分之一的家庭爲單親，像電影E、T中的家庭一般。紐約時報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廿八日頭版的報導是「許多年輕女人現在說她們會把家庭擺在事業之上。一個普林斯頓大學四年級女生，扶輪社獎金的得主，希望念商學研究所，並在國際金融工作。但「她打算辭掉她的工作，以八年時間做個全天候的母親」。當婦女工作機會越來越多，升遷機會比過去多，許多唸大學的女生……正在問，拼事業比養小孩和親自照料他們重要嗎？」（註：女性主義第二章P 199）四分之一的單親家庭如果如預測的一直成長下去。到了下世紀時，雙親和家庭的意義對一個小孩子而言，已經不重要了。

七〇年代的女權主義者面對著女權運動一世紀後的可能成果——婚姻

家庭的無意義傾向，家庭、親情將不知以什麼內容給下一代，而徬徨不知如何踏出下一步。八〇年代的女權主義者則容許個別主體自行在實際經驗中選擇自己的造型——即使是窄裙加高跟鞋的打扮，也不再被膚淺的認爲是性的奴隸。同性戀者不能再用數系裏的整數去批判，而應用數系裏的實數去理解。

八〇年代的女權主義的貢獻是瓦解了過去「大男人」、「大女人」的權威觀念、和理論的地位，打開了道德、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認識上的死結，讓每個不同的意見和信息有表達、傳播的機會。但是觀念終究是觀念，對大部分的國家和地區而言



，實際牽制男人和女人及同性戀者的法律及社會制度並沒有鬆綁。

女權主義者在面對著這層層的法律叢林，已不再站在叢林外頭叫喧，而改變策略從修法著手。這也是近年來女性主義被認爲消聲匿跡的原因。

現代的人類分工，男、女、內、外的界限已經模糊掉了，「讓每個人都能選擇其所愛」、「讓每個人的才能都能充分發揮」應是新的分工精神；這時，法律應該如何訂定新的遊戲規則，則成爲考驗這一代社會菁英的決策者如何與資產階級妥協及對無產階級交代的良心問題。

註：貝蒂·傅瑞丹，女性主義第二章 P:242。

參考書目：

1. 女性主義第二章。洪健全出版
2. 當代雜誌 51、35、8、5期
3. 文星雜誌
4. 首都早報「女性自我意識的反省」——成令方。「凱普倫談後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何春蕙

5. 李亦園「文化人類學」：商務出版。

6. 中國論壇 23 卷 11 期。

場。迄一九八〇年十大民營財團總營業額已達GNP 16%。另外對於美、日貿易方面，迄一九六四年日本超過美國為台灣最大進口國。迄一九六七年美國超過日本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國，自此這種進出口依賴的貿易形態大致篤定。就進口內容而言，台灣所需工業投資的設備及零組件多由日本進口，生產技術及行銷管道多由日人控制，台人只賺收代工或裝配費，此外台灣對外行銷管道亦有%為外國貿易商所控制，其中尤以日本商社為多。就貿易收支而言，對美貿易依存度（對美進出口總額/台灣GNP）始終高居不下，而對美貿易黑字始終超過台灣貿易總黑字，由此可見對美國貿易的依賴。

出口導向經濟的全面發展，使台灣經濟的貿易依存度（總進出口值/GNP）達驚人地步，一九七一年為五九·六%，一九七六年為九〇·一%，一九八一年高達一〇〇·七%。因此，當國際物價水準相對上漲，立刻會反映為國內物價上漲，如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國內物價上漲率為四七·五%。因此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後的台灣經濟，宛如建立在流沙之上，既無自主發展的根基（原料、技術、行銷多依賴外國），同時也愈陷愈深，對國際市場波動極敏感。這種超級的貿易依賴，在八〇年代世界經濟逐漸停滯成長後，終於面臨陸續危機。

另外在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下，政府為維持低廉的工資、糧食價格、充沛的勞動力與其他更多農業資本轉入工業部門，故仍繼續其汲取稻米價格政策。結果自一九六八年左右，農業部門已逐漸顯出疲態，而有農產品價格上揚，農業勞動工資上漲且農業勞動生

產力下跌的現象。在一九六九年，農業生產出現四·六%的負成長，而農民自六〇年代初已成為收入最低的職業。因此，此時期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事實上隱含政府與企業間緊密結合，並利用財政、金融、貿易等整頓來誘導內部生產秩序並支援對外擴張的經濟政策。但不包括社會移轉的社會福利政策，故呈現以犧牲非企業部門（如農業部門）及勞工階層，而強調以出口順差帶動經濟發展並累積外匯。

廢墟農村

第一次進口替代

工業化階段

1973~

國際困境

一九七〇年代台灣的經濟發展，基本上仍處於一九六〇年代的延長線上，繼續帶動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產業。但此時期連串的國際政經事件（如一九七三、一九七八兩次石油危機、一九七一國府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二尼克森訪問大陸及中日斷交……等）對台灣地區的政府與人民產生極大的壓力。在「危機意識」下，資金大量外流，而政府也因而推動經濟國際化，且從事內部改革以擴大參與基礎（如一九七二年起開放中央民代選舉）。並在民間投資意願低落下，推

動以國營企業為中心的投資計劃（如十大建設）。結果，外資持續擴張，經濟持續成長。但同時也使過去隱藏的各種經濟、社會與政治問題逐漸顯現出來。

一九七三年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改變了全球的經濟生態，大量跨國公司資本流向工資低廉的開發中國家，促使新興工業化國家必須面對強烈的競爭壓力。另一方面，已開發國家的保護主義已從七〇年代中期起，對新興工業化國家產生衝擊。不過第一次石油危機係世界性的問題，重化學工業化政策（十大建設的一部份，即所謂第二次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則為台灣自身經濟問題，此一政策的公布與實施，恰好與石油危機同為一九七三年，可說純屬巧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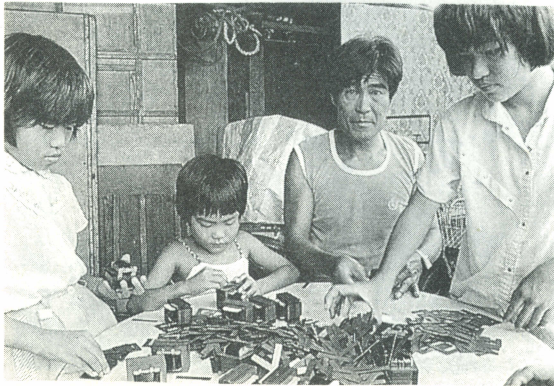
十大建設

一九七二年五月，蔣經國任行政院長後，就以「十大建設」與「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開始了七〇年代的一些努力。十大建設包括交通建設、機場港灣、原子能發電等七項國家基礎建設；以及鋼鐵、石化、造船三項重化學工業投資。此乃因自六〇年代經濟快速成長的結果，基礎建設與能源部門的發展直落在產業之後，且差距龐大。而其基本性質為壟斷性資本主義體制的鞏固，使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型得以擴大再生產，加速進行。十大建設大規模的公共投資，確實彌補當時私人投資之不足，有帶動經濟景氣復甦的功。但重化學工業政策卻沒有成功的轉換台灣的工業生產結構。因為石化工業上游的部門由國營事業緊抓不放；鋼鐵部門生產的仍為中低級產品；造船部門在本質上仍屬勞力密集工業，其建造技術與資材供應多仰

賴外國，且兩部門均民營化未成（民間企業意願不強）。重化學工業在台灣的國營事業中效率差、成本高，加重下游工業成本，減低對外競爭能力。而民營部門則在當局的保護下獲利，放鬆技術革新與經營改善的努力。工業方面的成長來源仍然是依靠紡織、電子等勞力密集產業。

農村再剝削

而「加速農村建設方案」原是希望透過基本公共投資、農業現代化及保證價格，增加農業利潤以重建農村地區，並廢除汲取性稻米政策。但事實上除了保證價格措施對農民有些微助益外，其它的農業現代化工作仍然停滯不前。而農村因在六〇年代所造成的人口外流及農業收入低落而產生雙重危機，且在七〇年代初期形成一重要的政治議題，使農村的勞動力已無法再以同樣的方法來擠壓到工業部門。而使得政府在七〇年代致力於農村基層建設、農林地區工業區開發、提供工業生產空間再布署的基本條件（工廠大量侵入農村），並且鼓吹「客廳即工廠」，使無數中小工廠滲入農村，動員了潛藏在偏遠地區的邊際勞動力（如婦女、老人、兒童）。這些分散到鄉鎮的中小工廠，大多具有以下共同特徵：勞力密集、競爭激烈、風險高、勞動條件惡劣、不計外部成本（如污染、噪音、公共危險、阻礙交通、違反土地使用規定）等，而為了進一步壓低工資，中小企業遂採取各種僱傭策略，如按件計酬和臨時工，甚至採取放料生產的方式，把零組件散發到各家計單位，利用邊際勞動進行裝配加工。處於「產銷分工，層層分包」體系末端的大量



1972年謝東閔號召「客廳即工廠」，使農村家庭成為密集輕工業加工區的延長，勞工的傳統家庭生活起了重大變化。

農村小型工業，承擔並分散了中小工廠的外部成本，並因此緩和了可能的衝突。〔註〕

一九七〇年以後出現的農村小工廠，除了政府在鄉鎮規劃的工業區內的工廠外，大多是建立在農業區，不能合法登記為工廠，即使是前者也把一部份工作包給附近村落的小型工廠。小工廠依附於母工廠的訂單，從事簡單零件或原料加工，它們之間絕少簽訂合同契約。對母工廠而言，小工廠分擔了它們投資的風險，但卻不能為小工廠提供任何保障，小工廠因此處於不穩定的依附狀態。母工廠則透過國外進口商、進口公司聯繫取得訂單，或是本國的貿易公司找到國外的買主，將訂單交給母工廠製造，然後負責檢查產品品質，報關出口。經由此特殊的產業結構，鄉村、市鎮的小型工廠取得了與外部世界市場的聯繫。由於行銷與生產分離，分包體系也分割了生產流程，使得一般勞工能以較少的資本以及簡單的技術能力經營小工廠，這點強化了自雇策略實現的可能，構成小型工廠成立的基礎。然而這也意味著小工廠間激烈的競爭，使母工廠得以壓低工資，無形中限制了潛在的利潤。尤其是新成立的工廠往往不惜將工資壓得很低，以求取工作。小工廠的生產方式往往彈性運用家庭的老、少、婦女勞動力，甚至這種邊際勞動的運用發展為小型工廠的再轉包，將原料、零件放到鄰居、親戚的家庭中，形同按件計酬，或者不定期雇用附近鄰里未成年的童工。而這種「分散式的分包體系」因具有極大的機動性及勞力密集、低工資的特性，正是台灣在七〇年代世界市場與價格的易變性獲益，及經濟能持續成長的關鍵內部條件。

一九七八年第二次石油危機，而年底更因中美斷交而產生政治危機。儘管這次的衝激似乎沒有七〇年代初期那麼強烈，政府還是如前一樣使用各種財政、貨幣與獎勵出口、投資的措施，以化解各種政經上的壓力。一九七九年後，政府先後宣布十二項經濟建設，加強中小企業融資、幫助企業界從事研究發展工作，而且開始推動經濟自由化、國際化。一九八〇年則成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希望藉由政府的力量來發展高科技產業。但因民間資本的不熟中及民間企業技術層次尚淺，缺乏技術專門人才，使得台灣在一九七八年的電腦市場中，外資企業佔70%。台灣經濟經七〇年代的發展逐漸邁向成熟的階段，而真正進入亞洲新興工業國（NICs）之林。

〔註〕因農村小型工廠成員多有親屬、鄰居關係，而這種傳統的親族關係模糊化了勞資關係，緩和了勞資可能發生的衝突。又這些工廠多為具污染性，對農地造成不小的傷害，但透過此制度，緩和了農工可能爆發的衝突。

反省與挑戰

八〇年代

面臨的課題

八〇年後台灣所面臨經濟壓力是多重的。從國際

壓力而言，新保護主義風潮和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地區對外貿易的崛起、亞洲新興工業國間的競爭，都給植基於出口貿易的台灣經濟極大的衝擊；而就國內壓力來說，民營資本向公營部門的挑戰，部份官商資本的大規模舞弊，以及勞力密集產業利潤的節節下降，都使台灣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動盪。

新保護主義崛起

新保護主義的崛起，可以一九七三年國際石油危機為起點。由於OPEC的集體抬價，造成世界經濟一九七四—七五年陷入停滯膨脹的困境，先進國普遍產生高度失業和資本設備利用率下降現象，促使保護主義抬頭。由此而引發非關稅貿易障礙、政府對產業援助、為維持市場占有率而成立國際卡特爾等。而歐美市場對台灣外銷產品的限額、無優惠免稅待遇、及非關稅貿易障礙，如延後轉入許可證、片面指控超裝、課反傾稅等，對台灣產生極大的影響。

勞力密集工業面臨淘汰

此外，由於台灣經濟長期仰賴勞力密集加工生產，技術升級始終相當有限。導致一九七七年後生產力成長率即逐漸落後於工資成長率，即廠商的利潤逐漸降低。進入八〇年代後，紡織業和石化業更成夕陽工業，投資環境也逐漸惡化。投資環境之所以惡化，實由於利潤率節節下降，以及對投資前景的不確定性，導致民間投資意願低落。而利潤率之下降，實不僅由於新保護主義限制了出口市場；此外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國大陸取得輸美優惠關稅，也逐漸成為後來居上的

競爭者（還包括東南亞國家），使得台灣紡織、鞋類、手提袋、塑膠、自行車等產品先後面臨競爭危機。更嚴重的是在美國強力施壓下，台幣升值達35%，使出口商生產成本陡增。而使得部份出口商為求較高利潤，改採轉投資分散風險，或到東南亞或中國大陸作整廠輸出，而在外地設廠後又與台灣競爭，形成惡性循環。而部份外商相繼宣佈撤資或停止生產，尤其是勞力密集的消费性電子產品，有轉往中國大陸或東南亞設廠的趨勢。

一九八七年由台灣經香港到中國大陸的出口額六十億美元，佔台灣出口總額二·二%；據估計，兩岸開放直接通商，則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額將達出口總額六·六%。此外，為了因應韓、港、星的挑戰，國府不得不於一九八八年三月決定放寬煤、棉花、鎢、錫等工業原料自中國大陸進口，以降低紡織、水泥、鋼鐵業的生產成本。總之，八〇年後台灣投資環境的惡化，以及中國大陸改採開放出口政策，都有利於兩岸經貿關係的進一步發展。畢竟中國大陸龐大的廉價勞工和優惠投資規定，極可能引發台人轉投資或整廠輸出行動，而低廉工業原料更是民營資本的夢寐以求。為了兩岸經貿關係的穩定，二者勢將聯合形成國內壓力，促使國府對中共開放「三通」（通商、通郵、通航），並由此確立兩岸接觸模式，而產生兩岸談判。除非台灣能在短時間內產業升級，來改變惡化的對外貿易條件，或經由公共投資，擴大國內市場來扭轉出口導向經濟，否則兩岸「三通」趨勢將很難避免。

金融失控與開放民營



40年來，台灣農村中的低層勞動者，勤勞民眾為40年台灣社會發展、創造真正的財富與資產

可是由於國府始終缺乏有效措施，大量游資和金融機構爛頭寸，不僅無法轉為生產性投資，更變相淪為各種金融投機，使具有特權的官商資本得以居中操弄，終於在八〇年代陸續爆發各種經濟犯罪，如十信、亞信、僑信金融風暴，與近來地下投資公司紛爭層出不窮。近年來國內投資環境仍未改善，使期貨公司、證券市場、黃金買賣、房地產等等金融投機仍然鼎盛。

而除了逐漸失控的金融投機外，日益強大的民營壟斷資本更陸續向國府所控制的國家獨佔資本挑戰。此意味著國家獨佔資本的生產和流通，已經不符市場競爭的效率原則，如營建工程特權議價（由榮工、唐榮、中華工程瓜分）；工業原料生產成本的漫無節制（如原油、鋼鐵）；金融管制造成資金流通困難；經濟政策混亂多變等，都造成民營資本進一步積累的障礙。換言之，逐漸坐大的民營壟斷資本，在八〇年代進出口競爭能力日趨劣勢之時局中，早期公民營「官商一體」的共生關係，已逐漸演變成「官商鬥爭」的對立關係。而促成這種轉變的因素，包括民間資本通路的受阻，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的自然癱瘓，以及其整合力量的衰退。公民營資本鬥爭主要指市場流通和行政效率，而其政治效果，最主要仍指向行政國家的瓦解，以及法統神話的徹底揚棄。

台灣未來經濟體制

總之新保護主義的崛起與國內投資環境的惡化，使進出口商和民營壟斷資本產生開放兩岸經貿關係的內在壓力，而國府缺乏有效措施下，民間游資和銀行

爛頭寸也轉為各種金融投機（含大家樂、六合彩）和經濟犯罪，並使公民營資本邁向緊張對立的局面。基本上，整個過程仍指向資本自由化，而國府的管制經濟，也因此承受前所未有的衝擊，在內外夾擊中不得不逐漸改弦易轍。而政府近來對資本自由化的措施及趨勢包括公營事業民營化、減少進口管制、降低進口產品關稅、部份開放兩岸直接貿易、開放東歐貿易、放寬外匯管制、開放期貨、證券市場及金融機構，核准國內黃金買賣。及制定獎勵產業升級條例等。

八〇年代之後經濟自由化的呼聲逐漸提高，這一方面反映了私人獨佔資本的力量已足以與國家獨佔資本相抗衡，另一方面則表示資本獲利率的下降，迫使資本必須尋找新的出路。國家獨佔資本所壟斷的高利潤正是私人資本所覬覦的，因此隨著私人獨佔資本的膨脹，國家資本所獨佔的經濟領域必然逐漸崩潰，就此點而言，私人獨佔資本在消解半封建的黨國控制網上具有一定的作用。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未來兩三年內，公營事業逐漸轉為民營、或經濟戒嚴區逐漸開放後，私人獨佔資本之間關係的重組，實力的消長，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累積的變化及政治上「金權政治」的顯現，都會深刻地影響到台灣經濟體制的發展。還有政府提倡的資本國際化政策，是否意味著台灣將朝國際帝國主義邁進？而政府如何避免產業外移的力量來促進產業升級，都是九〇年代政府必須面臨的課題。

40年不計，一切代價的逐利發展，居於社會底層的勞動群眾一直處於無發言權利的境遇中，工業污染的發生，成今日嚴重的公害。

